

湘西地区侗族传统村落神圣空间演变的启示

——以芋头村为例

张子涵

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2

摘要: 芋头村是侗族传统村落典型样式,既有宗族血缘相联系的神圣空间,又有神圣空间背后隐喻和象征空间及社会秩序的人文信仰型神圣空间和复合型神圣空间,是社会文化的衍生含义。通过对侗族神圣空间的整体综合,更能准确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族群命运共同体。神圣空间演变本质不仅仅是神圣空间地方性变迁的简单过程,也是传统村落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构,其背后文化属性的改变。神圣空间的演变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观念、价值的转变,是按照社会规则、文化意义联结的一种地方性生活空间。与过去相比,给现代发展带来一定启示。

关键词: 侗族; 神圣空间; 启示

Inspiration from the evolution of sacred space of Do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Western Hunan

— Take Taro Village as an Example

Zihan Zhang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unan 421002

Abstract: Taro village is a typical styl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of the Dong nationality. It has both sacred spaces linked by clan and blood, and humanistic religious sacred space and compound sacred space which are metaphors and symbols of space and social order behind the sacred space, which are derived meanings of social culture. Through the overall synthesis of the sacred space of the Dong people,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an ethnic group and the community of ethnic destiny can be more accurately understood. The evolution essence of sacred space is not only a simple process of local changes of sacred space but als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change of cultural attributes behind it. The evolution of sacred space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beliefs, ideas, and values, which is a kind of local living space connected according to social rule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e past, it brings some enlightenment to modern development.

Keywords: Dong nationality; sacred space; revelation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 CX20211254)

作者简介: 张子涵(1997—),女,河北唐山人,硕士,主要从事传统村落神圣空间研究。E-mail: 1581273855@qq.com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村是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侗族村寨中的重要节点，2001年，芋头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芋头村是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于2014年11月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芋头村具有鲜明的各具特色和价值，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为做好《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13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通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中确定的以保护和发展的目的村落专项规划。必须认识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人们从事劳动创造历史伟业的动力，也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源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生动的，是时时刻刻展现纷繁复杂的现实利益的动态表达，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神圣空间是村落居民的一种文化信仰，其背后的文化属性也是为了能够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保障和可持续。

一、芋头村演变的基本概况

芋头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先民在距今600年的明朝就迁到芋头，到清中期的300多年间村落不断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乾隆年间以后到今的300多年，村落不断发展，经过续建、复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芋头村现在建筑时间大都为20世纪50年代末后，明清时期的建筑大多为风雨桥、鼓楼及少数民居，较为分散。芋头村的演变经历了五个典型历史时期，村落由西向东扩张，逐渐发展，主要体现在，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89年）刚开始建寨子，师祖杨大伞在此定居；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08年），外来栗姓在此定居，人口越来越多，侗寨建筑规模逐渐扩大，逐渐向场坪、牙上、深冲等山丘盆地安寨住营；清朝顺治年间（公元1644-1611年）村寨失火，复建以后，住址主要选在以芋头溪为轴线向两边不居住的位置；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建寨脚桥，后来又建龙氏鼓楼、牙上去鼓楼等；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芋头村建筑规模达到顶峰；现在芋头村的建筑风貌大都是沿袭清中期以来的侗族传统风貌。2001年6月25日，芋头侗寨古建筑群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五批）。芋头村演变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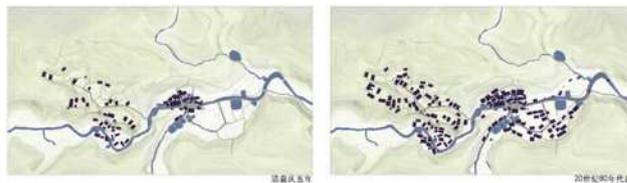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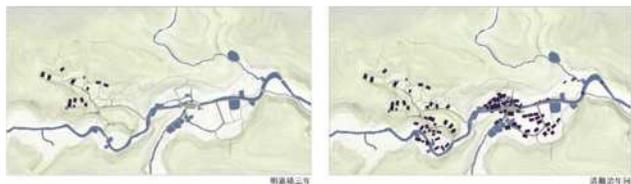


图1 芋头村落演变图

（来源：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传统村落的神圣空间：鼓楼和祠堂

（一）鼓楼

鼓楼作为侗寨的文化象征，具备传达信息、保护村寨的作用，也是款活动、侗族大歌等传统文化传播集一体的复合型神圣空间。鼓楼是侗族精神传承的主要标志之一，具有图腾属性，被认为是杉树形象化的产物，具有图腾崇拜的特点。鼓楼所举行的仪式认同感是侗族人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房族的象征，社会组织的标志。

1. 原始崇拜——中心柱

侗族社会仍然保持原始社会的遗风，杉树被认为是可以保护居民的神树。侗族村寨往往是“未立寨，先立楼”，在场坪和住宅基址树立一根杉木作为标志。中心柱是当时传统村落的社会活动中心，具有保护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心柱、神杆等也被认为是祖先崇拜。《祭祖歌》中“未置门楼，先置地土。未置萨门，先置萨柄。”这首侗族歌曲中将“楼”与“萨柄”也就是侗族的祖母萨岁坛相互对应，反映出侗民对于祖先的崇拜，将萨坛与鼓楼相互对照，鼓楼没有祭祀祖先的牌位，中心柱作为象征，是生命的符号。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心柱树立具有有象征的的意义，是一种神力或者一种崇高的力量。并且中心柱代表方向感、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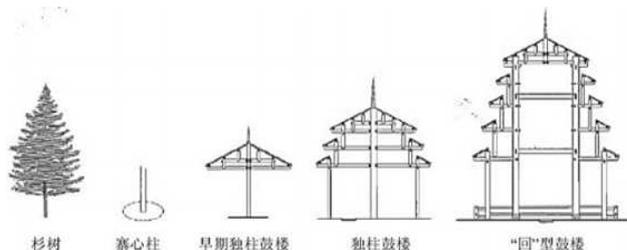


图2 鼓楼的图腾属性示意图

（来源：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鼓楼认同

侗族社会的小群体中，仍然受原始崇拜的影响，血缘、宗族关系比较明显，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村民的群体共同价值观念和个人感受所形成的集体认同意识，也有利于加强与鼓楼之间的互动。例如，村落中的认同命名意识，因而在满月时

进行活动的命名。等到11-13岁时，会在鼓楼里进行第二次取名，这也被称为“鼓楼名”。这种类似于成人礼的鼓楼取名意识表明他被社会正式接纳。鼓楼里举行的仪式，表达了个体对集体的认同，发挥功能有机体的作用，鼓楼里进行的民俗文化的活动，也让鼓楼成为一个民俗的传承空间。

（二）萨岁坛

“萨”作为侗族的祖母神，是侗族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萨受到侗族集体的祭拜，是原始社会人群在原始社会中所构建的神灵，是把心里状态反映给神灵，并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和推崇进而传承下来。萨是一种原始母系氏族时代的产物，在发展的过程中，萨崇拜是一种原始母性崇拜和英雄崇拜的结合。萨堂有专人进行管理，与其他宗祠和祖庙等不同，萨堂不具备牌位，祭坛里的东西也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侗族所呈现的萨是一种文化信息，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崇拜者，她是保护、兴旺、主宰的原始宗教产物。萨岁坛的祭祀主要用于过年过节普通祭祀、歌唱、赛芦笙的“多耶”祭祀，主要是对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民族历史进行传承；将文化意识和祖先观念进行传播，增强民族凝聚力。

（三）宗教信仰型神圣空间：祠堂

祠堂是子孙后代为了祭拜祖先而建造，祖先崇拜也是传统村落文化内容之一。侗族聚族而居，村落与宗族重合。芋头村的社会组织模式具有侗族特色，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决定的“家庭-房族-寨-款”社会组织结构。从空间情况来讲，就是作为整体存在。房族内部民居以鼓楼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是侗族核心的社会组织，对各个家庭内部进行管理和约束。寨是由地域相近的几个房族构成，管理者作为寨老，对内部的房族和各个家庭进行约束和管理。“款”由地缘相近的侗寨联合而成，每年约定好相临近的鼓楼或者款坪进行讲解、管理。逢年过节，举行祭祀祭祖等仪式，增强民族之间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从局部看，村子的内部主要是按照宗族进行排序，由自给自足、趋向分散的家庭被相互连接到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宗族。在组织社会中，祠堂成为维持伦理和治安的权利来源，通过居民自治，保证村落内部社会的稳定和拥有良好的秩序。

三、传统村落的世俗空间：休闲间

（一）传统村落神圣空间：人文信仰型神圣空间

侗族传统村落中存在重要的神圣空间：人文信仰型神圣空间。人文信仰型神圣空间，是传统村落社会中集休闲、娱乐和交流为一体的空间。作为休闲间的重要交际场所，能够交流很多信息，爱好读书的人会分享学校

知识、书籍或者经验。中国传统社会具备完整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约束体系，居民长期生活在传统社会中，遵循相关的秩序纲领和规范教条，且具有明确的价值观，完备的管理体系，能够进行教育、传播，并形成一套传统道德教育体系，有利于维护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侗族的宗族社会和熟人社会在完备的伦理体系和道德信条的管理下，这种休闲空间下生活的人，能够维持生活空间的稳定性并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够让村落有效进行，且不断延续下去。

（二）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复合型神圣空间

鼓楼既是图腾的象征，也用于礼仪交往。侗族聚族而居，款制社会发展，“楼”也具有精神层面的象征，因为实际需要越来越多，发挥的实际功能越来越强，成为村寨中交流的公共建筑。

侗语中“堂瓦”与之相近，就是相互交流的场所。《试探侗族楼》是侗族史学家张敏所写，书中曾提到“罗汉楼”，楼是每逢有客人来临时，都集中在楼里，能够体现鼓楼早期社会功能是聚众议事和娱乐。随着社会的发展，鼓楼的社会文化功能越来越多，涉及侗民生活的各方各面，宣传民规、执行规章制度、处理和解决村民之间问题的政治活动场所；兴修水利等会议的举行，切实关心民生的生活场所；对歌、老人闲谈、迎宾送客等日常文化活动场所。

四、神圣空间演变的启示

侗族神圣空间从宗族信仰型神圣空间衍生为人文信仰型神圣空间及复合型神圣空间，不仅仅体现制度上的变化也是文化上的转变。百余年来，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先辈们和有志之士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族制度，但是对文化的性质和功能认知有限，经过文化换血，文化革命期间，严厉打击宗教信仰，用科学代替文化信仰，受制于思想的局限，经过建国以来，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和以前有所不同。

《英雄本色》中有过一段对话：“信不信有神？信，我就是神，神也是人来的，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就是神”。这与伊利亚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伊利亚德看来，神圣在一个物体上显现并不构成偶像崇拜。并不是神圣的物体或显圣物自身被崇拜，而是显圣物指向一个自身之外的另一种实在。“只有当一个物体具体地体现了某种不是它自身的东西时，他才转变成神圣的物体”。而且，被神圣所充满的自然物，总是表现出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神圣空间积极的一面是信仰空间的凝聚力，这也是侗族村落凝聚力的体现。

传统村落中具备完备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体系。

传统村落向心内聚，地缘和血缘因为宗族紧密相连，祖先崇拜凝聚整个村落，共同举办活动或者仪式，成为一个功能单位；传统村落修建祠堂等，祭祀祖先和神明，维持社会稳定和村落秩序有序，也会压制不安定的人。通过传统村落这种宗教信仰的凝聚及维持稳定功能，应该适当调整宗教政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现代以来，流动性越来越强，神圣与世俗的边界流动性和持续建构与协商，国家的力量与基层相联系，民间开放程度增强，国家慢慢接纳和认同民间信仰体系，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内涵发生改变，国家将空间治理纳入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在不同的社会世道有着不同时间维度的转变，需要研究者多传统村落神圣空间有重新认知，不断挖掘文化软实力带来的影响，推动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平衡。

五、结论

中国传统村落神圣空间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地方权利关系通过上层对下层的抵抗的一种“神秘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神圣空间会产生认同和冲突。随着神圣与世俗的发展和磨合，神圣空间形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念等会随着时代和国家制度发展产生改变，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活空间和道德伦理有序的生存体系。神圣空间既有宗教信仰型神圣空间又有有人文信仰型神圣空间和复合型神圣空间，建构过程中赋予文化属性，通过宗族、血缘、地缘关系，将人们聚居一起，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融合。神圣空间转变不仅仅是地方变迁的简单过程，其转变为文化属性的转变，涉及一个地方的经济效益、关系重构、文化渗透和价值评估等。对于神圣空间保持开放并且意识到神圣空间的非实在性，在“神秘力量中”获得某种平衡。

参考文献：

[1]李宗昉.黔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赵沁，田榕纂.玉屏县志：卷三[M].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3]张官五，吴嗣仲.沅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6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4]石开忠.侗族鼓楼[M].深圳：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杨慎初.湖南传统建筑[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6]通道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道县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7]侗族简史编写组.侗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

[8]米夏.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9]米夏.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M].宴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唐晓峰.文化地理学释义[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175-177.

[11]李玉臻.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J].学术论坛，2008（9）：178-181.

[12]闵丽.论宗教与中国现代性社会建构的兼容性[J].世界宗教研究，2017（2）：20-26.

[13]郭文.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形态、当代价值及其研究范式再认识[J].人文地理，2020，35（06）：1-8.

[14]王子涵.“神圣空间”的理论建构与文化表征[J].文化遗产，2018（06）：91-98.

[15]郭文，杨桂华.民族旅游村寨仪式实践演变中神圣空间的生产——对翁丁侗寨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J].旅游学刊，2018，33（05）：92-103.

[16]李明轩.从世俗化到多元化：彼得·伯格宗教社会学理论演变的逻辑[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3）：69-77.

[17]姜莉芳.侗族各地萨岁崇拜研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34（02）：24-28.

[18]张茹，陆琦.侗族鼓楼的时空分布与地域特征研究[J].华中建筑，2021，39（08）：111-117.